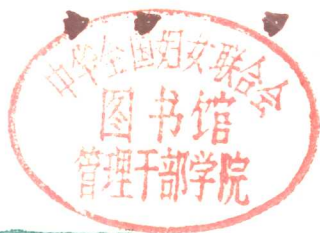


死 水

中国当代青年作家长篇丛书

● 叶 兆 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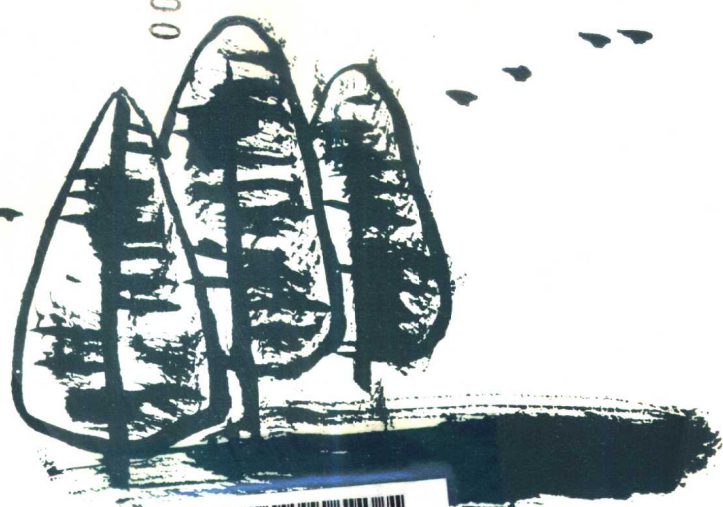
院图书馆



T247.5

423

007894



女子学院 0049503

图书馆
管理干部学院

死 水

叶兆言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死 水

叶 兆 言

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扬州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8.375 插页2 字数176,000

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4,300册

书号: 10141·1115 定价: 1.20元

责任编辑 卞宁坚

前 记

这座山就叫老山，地图上大约找不到。我曾问过许多人，如何取了这么个宝贝名字。谁也不曾给过满意的回答。一个双鬓花白的学者，慢条斯理地告诉我：老山，顾名思义，和人一样，总是年纪不小了。这个解释很有些滑头。和天地间万物一样，山也有年龄这是不言而喻的，可是究竟怎样才能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相当呢？没人知道。

这座山不高，多树，尤多常青的杉树。这种杉树的间距很密，细细的，高高的，很妙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。要是春天，在伐木后留下的树桩周围，在山坡的岩石缝隙里，在山洪暴发时冲过的鹅卵石堆上，可以看见成丛的杜鹃。这里的杜鹃有红紫黄三种。红的便是映山红，密密麻麻的一大片，远远地看过去，象一方方燃烧着的火；紫杜鹃有一种绅士和贵妇人的派头，温文尔雅，花瓣较之别的品种要大一号；黄的杜鹃据说有毒，可以入药，多生在背阴潮湿的坡道上。

我第一次登老山，正是盛夏，知了叫得令人心烦。仿佛每一棵树上，每一根树枝上都歇满了知了。一阵阵清风在杉树林里悠悠来去。在难得的知了声的间歇中，隐隐地可以听见淙淙作响的泉水声。沿山径向上，半山腰是一个缓和的斜坡，

一道细长、深不见底的大裂缝挡住去路。泉水的声音正是从这里传出去的。我曾连划着了好几根火柴，扔在大裂缝里，想看看这黑咕隆咚的世界，但所有的火柴都象一颗坠落的流星，只见一道暗红色的弧线，一闪，便什么都没有了。这道裂缝也不过两尺多宽，可我发现自己仍然没有跨过去的胆量。绕过去最容易，何况也未必弯多少路，只是如此这般，似乎太胆怯，丧失了男子汉应有的气概。进则冒险，退又有些不服气，人常常无缘无故地就走入自己为自己设下的尴尬境地。好在我轻而易举地又为自己找到了可下的台阶：其一，危险客观存在，可是我肯定能够跨过去，也就是说，是不想做，而不是不能做，所谓非不能也，是不为也；二呢，我对登上顶峰毫无兴趣，况且山间小径已经到此为止，说明前人也只不过和我一样。于是我感到了充实，心安理得，索性歇了下来，坐在一块晒得发烫的岩石上，乐在其中地听着泉水声。烈日当头，风忽然间小了，我不由得一阵燥热，好象有人藏在什么地方，正把无数个小火把投掷过来，弄得我不得不怀疑自己是不是离太阳太近了；同时也奇怪自己为什么竟没有去寻找一块树荫。我随即离开了那块发烫的岩石，从原路开始下山。上山容易，下山也不难，当我再回到出发地点，终于又为自己没有征服老山的顶峰反悔开了。

老山脚下是个很深的水潭，有两三个篮球场那么大。水很清，水面平静，象一面镜子，常常天是什么颜色，它便是什么颜色。一般人总以为它和老山的那道泉水一定相通，其实它只是一潭死水。

当地人把这潭死水叫做“娃娃潭”。

娃娃潭东面，错落着十几户人家，白墙黑瓦，掩映在树

林之间。只有一座古老的木房子孤零零地扔在一边。那房子是小碗口粗的圆木构筑的，缝隙都用黄泥嵌住了，只要用手轻轻一抠，就会有大的泥块剥落下来。门边的柱子上，长年累月地挂着一串大蒜头，长长的一大串，差一点就要拖到地上。一位七老八十的看林人就住在这栋古老的木房子里。老人鹤发童颜，胡须是白的，眉毛是白的，就连耳朵里多长多长的汗毛，也是白的。

那一年夏天，我几乎就一直和老人住在一起。一天三餐，入境随俗，每顿先必生吃一瓣大蒜。老人不管有事没事，无论刮风下雨，天天都要上山转几圈，我便一个人坐在木房子里，凑着一盏昏黄的十五瓦灯泡，翻来覆去地读一本不知念过多少遍的教科书。一过下午四点，我总是把那本书朝一个固定的角落里扔过去，自信已经完成了人生的一天任务，随后匆匆地赶到娃娃潭边。每一次我大约都是准备去游泳的，有几回甚至游泳裤都换好了，可说不清到底是什么缘故，竟一次也没有游成。

我常常独自一个人，坐在小杉树林边，坐在满是杂草的小路上，有时就穿着游泳裤衩，抱着赤裸的臂膊，任凭蚊虫叮咬，默默地望着娃娃潭的那一边出神。我不知道对岸究竟有什么东西吸引了我。

娃娃潭的那一边，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医院。两道红砖高墙，从水潭的两侧伸出去，穿树林，翻山坡，最后渐渐合拢，整个医院便被包在里面。我坐在那里，偶尔点上一支香烟，可以轻松地看见医院的内部。首先是那十几块形状各异的太湖石，七零八落地搭在水边，让人很容易地就联想到一些动物——确切地说，是一些动物的标本，譬如山羊，譬如老

虎。那块貌似老虎的太湖石旁边，是一个苏州园林中常见的那种玲珑剔透的亭子。亭子很小，很旧，不高，大约一抬手便可碰到顶边，朱红色的油漆早剥落得斑驳陆离，但也许正因为如此，才更添了古色古香的味道。紧挨着小亭子，是一块不足半亩地的紫竹园，常常可以看见成群成群的麻雀飞进去、飞出来。竹园的边缘，正好分出两条细鹅卵石铺成的小路。一条通向住院处的主楼——那是三幢各自独立，又相辅构成统一整体的五层高楼；一条通向高干病房、神经科病房和门诊部。其中高干病房就在竹园过去二三十米处。它是一栋三层的洋楼，有着高大的玻璃窗和宽敞的凉台，凉台沿上排满了大大小小的花盆，一年四季都盛开着鲜花。

天长日久，我终于发现，小亭子侧翼的小草坪上，是一个奇妙的报到处：每天总有些病人要到这里来转一转。他们似乎都有自己的位置、自己的事，往往互不相扰，同时却又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：有的人一路走，一路漫不经心地甩着手，深信任何运动对身体都有好处；有的人哼着小调小曲，热情过度，见着谁都主动打招呼；有的人却默默无言，愁眉锁眼，一副怨天尤人的样子；有的人前不久刚在这里学会了太极拳，如今又在这里孜孜不倦地教别人。偶尔，也有缺胳膊少腿的，中风瘫痪的，或让人扶着，或坐在手推车上，被护士或家人送到这里。这些病人之中的病人，也许较之旁人更不幸，所以每当他们一出现，就立刻会博得不少同情和怜悯的目光。

另外，我还发现，那一阵子几乎天天与我同时，都有一个姑娘怯弱的身影出现在娃娃潭的那一边。我不知道她是谁，也从来没有想过她会是谁。每次她总是捧着本书，从竹

园后面悄悄地走出来，或走进小亭子，或去坐在那些动物标本似的太湖石上：读书，休息，再读书。天天如此，日复一日。

好象隔了一层雾似的，我对娃娃潭那一边的观察总是迷迷濛濛的。这似乎是一种无意识的行动，毫无目的性可言。我既没感到自己的行动可笑，也深知它实在没什么深一层的内涵；唯一的解释就是：不知不觉地，碰巧就是这么做了。横在我面前的是一潭死水（只是一潭死水），并无什么象征的意思，虽然我试图把它理解成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。我不过仅仅似是而非地幻想过一阵子，象梦境一般。在那不尽真实的梦想中，人们时常幻觉着不可知的彼岸。彼岸，似乎却又有一种沉郁和富有诱惑力的东西在召唤。也许，正是这种莫名的吸引力，使人忘乎所以，喜怒哀乐，终于滋生出那种不自量力的妄想来。

468200

司徒每天睡觉前，总得下楼逛一圈，活动活动。他自己也觉得这行动有点莫名其妙。通常是脑子里什么都不想。有时抬头看看星星，看看月亮，或者什么都不看，然后从住院处大楼东边往西走，到了病理科再掉头，每次三个来回。病理科对面就是太平间，司徒每次走过那里，一想到这房间里横七竖八地躺着一具具僵硬的尸体，让雪白的被单裹成一条一条的，便禁不住有些异样的感觉：既不是怕，也不是不怕。据一本新编的体育杂志介绍，临睡觉前活动一番，对身体可以有许多好处，有许许多多的好处，尤其是在治疗失眠和心脏之类疾病的方面，并称已经过实践证明，其效果绝不在早起锻炼之下。虽然司徒并不失眠，心脏也还算正常，但这对他来说，依然是老天爷给怕死的懒人送来的一个福音。因为睡觉对身体没好处，几乎是一切讲究养生之道的人喋喋不休所乐道的话题。在大学里念书，司徒每天早锻炼总是起不来；常常起床铃响过，他在被筒里挣扎一番，打两个滚又睡着了。碰上突击检查，政治辅导员不得不把一些懒惰的大学生从热烘烘的被窝里揪出来。司徒每次都是拎着短裤躲在厕所里，冻得瑟瑟直抖，熬到辅导员离去，便再钻进被窝狠狠地补上一觉。一学期下来，司徒生的病最多，病假占了全班总额的二分之一。按照辅导员的说法，这全是不能起早锻炼的缘故，是报应。其实司徒心里最有数，怪来怪去，还是怪他们的政治辅导员。不锻炼身体自然可以算一二成因素，但

八九成因素则是自己在厕所里冻出来的。三九严寒，滴水成冰，即使是身体最棒、营养最良的运动员，从热被窝里钻出来，穿着短裤衩子，在坏了玻璃窗的厕所里泡十分钟，也难保不感冒打喷嚏。

自从住了医院，司徒已经养成了晚上散步的习惯。虽然谁都知道，眼的毛病和体育锻炼之间，实在没有什么有机的联系，特别是司徒这样的眼底出血。但是政治辅导员关于身体好坏和体育锻炼之间的因果演变，尤其是“报应”这个字眼，给司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荒唐之处便在这里：司徒在学校学的、他自己所信奉的全是唯物的东西，然而常常免不了迷信起来。他并不真心真意地相信因果关系、相信报应，却又常常真心真意地害怕报应。“每天走一走，活到九十九”，尽管司徒找不出自己非要活九十九岁的理由，但他不得不在形式上把这句长寿的格言勉强地接受下来。

按照医院的规矩，病房晚上九点熄灯。熄了灯，司徒便到值班室去看会儿报纸，要么就和值班的医生或者值班的护士，海阔天空地吹吹牛，从电影明星到体育明星，中国的，外国的，以及各种不同类别的智力测验，无所不谈。只要人家不讨厌他、不撵他，他便一定要坚持到十一点。然后从容地走下楼，完成三个来回的散步任务，就好像他刚进大学时，每天早上呆定死记三十个英文单词一样机械。散步归来，病房里早已是鼾声一片。刷了牙，洗过脸，司徒如果还能记得的话，便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五分的硬币，握在手中，狠命地摇上一阵，然后摊在手心上，凑着透进病房的走廊灯光，仔细地辨一辨正反面。司徒自信印有国徽的一面总是正面，而且隐隐约约地觉着，如果遇上正的一面，第二天就会

有好运气。

这一晚，司徒碰巧又遇到了有国徽的那一面，不禁暗暗自喜。他拍着脑门想了想，不知道第二天会撞上什么好事，于是小心翼翼地把硬币收好，倒头便睡，一直到天亮，连梦也不曾做一个。

司徒在医院里已经住了两个星期。住院的病因，至今还没有真正地搞清楚。他的住院卡上先写着“眼底出血”，后来又改成了“视网膜前出血”。医生们的意见极不一致：有的认为引起病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外伤，由于强烈的震动；又有的医生以为遗传是主要原因，是一种先天的过敏性反应疾病，与结核菌素或其他感染病灶及其内分泌障碍有关；也有的医生认为是一种综合症，既因为外伤，又因为先天性的病变。只有眼科主任蔡华教授，这位号称“远东一把刀”的眼科专家，凭着自己四十几年医治视网膜疾病的临床经验，为司徒仔仔细细地检查后，才得出最实事求是，也是最令人信服结论。在引起病变的一栏上，蔡华只写了四个字：原因不明。

司徒从小就好动，什么球都愿意打，尤其喜欢足球。进了大学，他是校足球队的替补队员。每当和一些不太起眼的对手进行比赛，他便上场踢后卫。他的特长是体力好、跑得快，常常球滚到哪里，人追到哪里。教练员喜欢他，也只是为了这一点，不喜欢他，还是为了这一点。有时，司徒助攻到了对方球门前，碰上机会，或是头顶攻门，或是一脚劲射，一下子把球捅进球门，教练员免不了有立刻提升他为主力队员的念头。但过不了多久，因为司徒跑动过大，后防空虚，被对方一个快速反击，击破了自家的大门，便又要让他

坐冷板凳。今年夏天，学校里举行系际足球联赛，作为校队成员和中文系学生，司徒理所当然地做了中文系代表队的绝对主力。虽然中文系在所有的比赛中从未赢过一场，也不曾进过一个球，但司徒确实实场场踢得都很卖命。在和经济系的对抗赛中，他由以往的后卫改踢前锋，控制着前半场；围观的人只见他忽前忽后，满场乱飞，很是有点威风。上半场也不知怎么的，居然就给他踢进了一个球。不多久，对方也回报了一球，再不多久，又是一球。下半场到快结束时，双方都未进球，中文系眼看着要输了。正在这当儿，老天有眼，总算来了个罚角球的机会！司徒只盼着象平常练球时那样，来一个漂亮的鱼跃头顶攻球，挽成平局延长赛期，谁知只听“砰”的一声，地动山摇，他抱着另外一个人结结实实地摔倒在地上，球早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。司徒先以为自己撞在了门柱上，陡然想起自己离门柱起码还有四五米。他的后脑勺准准地、重重地撞在守门员的大脑门上，两人各“唉哟”一声，疼得说不出话来。司徒觉得眼前闪过一串金星，脑子里嗡嗡作响。围观的同学连忙跑来把他们扶起来，怕他们俩一时想不开，动起手来。不料两人各自心虚，一个只想到用头去撞球，一个只想到用手去接球，都以为过错在自己，连声赔着“对不起”，又赛起球来。结果是中文系输完最后一场球。半个月后的英语课上，因为考期已近，司徒几天晚上没睡好，禁不住打瞌睡。外语老师走到他跟前，敲了好几下课桌，司徒依然不肯醒，老师就只好让他背课文。司徒迷迷糊糊站起来，不知道大家为什么都在笑，只看见眼前慢吞吞地连续飘过几片红雾，外语老师的影子忽隐忽现，连忙用手使劲去揉眼睛。外语老师用拳头推了推眼镜架，好象早

就不准备司徒能答出什么名堂来，含蓄地笑了笑，宽宏大量地用英语请他坐下去，然后又对全班同学讲了外语唯有认真背书才能学好的常规道理，这大概是第三十几遍了吧。

下了课，司徒忙跑去找校医。五官科在二楼，五官科医师却在一楼和一个女药剂师聊天。天太热，五官科医生嘴动手动脚动，一头一脸的汗。“飘红雾？飘什么红雾！你要想混病假，直说好了，我成全你就是。”那医生因为司徒打断了他的谈话，一边上楼，一边挖苦着司徒，在楼梯拐弯处，又对远处含情脉脉望着他的女药剂师挤了挤眼睛。

“飘红雾，飘红雾，说说看，怎么个飘法？”那医生一脸不耐烦，拿过司徒的病历往桌上一扔，双手合抱，略微后仰，冷冷地看着司徒。

“反正是红的，”司徒叫医生说得有些心虚：“我、我也说不清。”他弄不清上外语课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；使劲地眨眨眼睛，晃晃脑袋，可是视觉依然正常，连他自己也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来混病假的了。

“哪个眼睛？这个，还是这个？”医生洗了洗手，从一个镀镍的铁筒里取出一块纱布，再打开抽屉，撕了两条胶布走过来。司徒指了指右眼，他本指望让医生用手电筒照一照，查查到底是什么毛病，可看对方横眉竖眼，怒气冲冲，全然不象好说话的样子，话没到嘴边，便被唬了回去。想来医生不乐是极有道理的：人家正吹在兴头上，你跑来说要看什么“红雾”；看了半天，自己都不知是怎么回事，这不存心是冲人家的“窝”嘛！想到这一层，司徒倒觉得是自己有点儿对不住医生，因而对蒙来的纱布就不便表示什么疑议了。

第二天，司徒觉得蒙上一只眼睛，走路做事总有些别扭，就自作主张揭去了纱布。无意之中捂住左眼试了试视力，不料不试还好，一试，吓了一大跳。他本来眼睛就有些近视，因此看东西有点模糊且不去说它，现在无论盯着什么东西看，那东西的右上方都有一片椭圆型的红雾。他起先指望能象上次一样，过一会会自行消失，可是一直到他找到了五官科医生，那块红雾还是顽强地定在那里。“谁让你把纱布揭去的？”那医生依然怒气冲冲，依然横眉冷对，他刚刚和医院的行政部门吵了一架，到现在还余怒未消。司徒想，这医生说不定又要给他蒙块纱布完事，便提出要转到校外大医院治疗。那医生正待要发作，一看司徒焦躁的表情，全然不象个装腔的学生，况且考期已到，混了病假也没用，不知怎么的就把责任心给唤醒了。他在手电筒里装了电池，弄了半天才亮起来，抱着司徒的脑袋照了又照，又仔细问了司徒的症状，这才认真地当回事。这医生在大学里学的是口腔专业，本事都在拨弄牙齿上，眼科学自然也懂一些，但毕竟不是自己的本行，只隐隐约约地觉得这病情比较严重，滴几滴氯霉素眼药水，蒙块纱布是定然治不好的。

在一个市属的大医院，医生用眼底镜一照便查出形成“红雾”的原因：眼底出血。按理，这病应该及时住院治疗，但是现在病房里早满得恨不能一张床上睡两个人。那医生是个年轻的女大夫，不太漂亮，皮肤很白，脸上隐隐地有一些雀斑，是一副书念得太多的读书人面孔。她喜欢把话说得重一些，既吓唬了病人，也显示了自己的医术：“这后果自然不会好的，亏你还笑得出。弄不好就会引起视网膜剥离——轻则严重影响视力，重则失明。”她全不管司徒眼神发

直，脸色已经变了，又重重地、狠狠地添了一句：“说实话吧，就是医治及时，这后遗症也不可能完全消除。”

到这时候，司徒才真感到事情不妙，小腿肚子有些抽筋。害怕这种心理怪就怪在这里，千万不能让它动了头，否则准不堪收拾。好比堤坝上的小沙孔，先是点点滴滴地渗水，接下来涓涓细流，再下来越流越多，水声哗哗作响，最后堤毁坝亡。“眼底出血”这词汇，司徒出了世头一次听到，新鲜之外，并不觉着与害红眼睛有多大区别，但听说会引起视网膜剥离，这就不能不使他坐立不安了。他父亲年轻时，恰恰就是因为视网膜剥离瞎了一只左眼，而他哥哥之所以不曾当上空军，也是因为眼底不合格，复试时淘汰下来了。据医生说，眼底出血的原因不外乎两个：一是外部撞击引起，二是先天性遗传。要说是前者，那么和经济系赛球时的碰撞分不开，当时他只担心脑震荡；要说是后者，那自然只有找他爸爸去算帐。

回到宿舍，司徒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妈妈写信。正好是吃午饭时间，寝室里的同学都上了食堂，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写信，肚子也不觉着饿。一个人即便到了七老八十的年纪，只要是想到了母亲，也会立刻变成孩童的。司徒想，要是说自己踢球时撞了一下，一定不会得到更多的同情，虽然体育锻炼在学校极受鼓励；倒不如说自己在学校读书，课如何紧，作业如何多，自己如何如何刻苦，如何如何认真，临了难免用眼过度，结果引起眼底出血。开始写信时，他只是害怕，担心自己的眼睛真会瞎掉；写着写着，心境起了变化，止不住要落下眼泪来。他恍惚觉着自己读书真吃了许多苦，很是委屈，怪来怪去全是读书不好，至于将来眼睛会不会瞎，倒

反而在其次了。

三天以后，司徒坐火车回到了省城的家中。一到家，他妈妈根据当年侍候丈夫的经验，二话没说，便让儿子卧床休息，她自己四处奔走，托人寻找好医生。司徒的父母都是教数学的，各带着一副度数不很深的近视眼镜，都具有典型的数学教师的脾气：冷静、刻板，做任何事都富有逻辑性。他父亲在大学里，已经做了许多年的副教授，眼下正在考虑招收抽象数学方面的研究生。他的母亲在教高中。自从“四人帮”完蛋，他家便成了高考补习生的急诊部。常常过了十一点，他母亲换了睡衣准备上床睡觉，还会有考生为一个几何题登门求教。司徒始终弄不清他母亲哪来的这股热情，而且从没有不耐烦的时候，好象她一生最大的乐趣，就是如何把所有的学生都塞到大学里去。司徒的姐姐刚出嫁不久，只是每星期六晚上才和姐夫一同回来吃顿晚饭。哥哥因为婆媳老是怄气，老婆动不动就躲在娘家不肯回来，而妈妈动不动就责怪自己儿子无能、怕老婆，终于一气之下出走新疆。为此，做母亲的赔尽好话，做老婆的不惜以离婚要挟，可他就是不肯回来，如今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。司徒一个人躺在床上，既不能看书，又不能看电视，除了听音乐、跟“美国之音”学外语，就只能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。好在他爸爸是老眼科病人，与市内各医院的眼科医生都极熟悉，加上不少人为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，对司徒妈妈有不尽的感激之情，谁都乐意帮个忙，自然而然，司徒住进了省城最好的眼科医院。

在大学里，司徒最怕三件事：早起床，早睡觉，考试。如今住了医院，考试的事可以暂时不去想它，晚一点睡觉也

不难，只是病房里天天早上冲开水，总要弄醒他好几次。先是水开之前，管道中要发出一阵狮子怒吼般的巨响来，偏偏安着管道的漱洗间和他的床头仅隔一壁；接下来水开了，值班护士站在病房门口大声喊着：“泡开水！泡开水！”然后是人们匆匆赶来赶去的脚步声，某人插队引起的争吵声，冲到一半时，水忽然没有了的抱怨声、叫骂声响成一片。这时候，司徒照例都是用被子蒙着头，不断地被吵醒，又不断地重新睡着。至于一天有没有开水喝，这似乎暂时和他没有关系。冲开水的浪潮刚过去一个钟头，早饭又来了。他还是赖在床上睡懒觉。要是有人心肠软，同情他，为他做好事代买了早饭，他便爬起来洗洗脸，一边吃早饭，一边向人家致谢。他的致谢免不了有些虚伪，因为他从内心里觉得，为了这点点互相帮助，大可不必过分客气，况且常为他打饭的是一位姓苏的护士，这人是司徒的老同学，既然是旧相识，这点点小关心更是受之无愧。要是没人为他买早饭，他就继续睡下去，等医生查过房才爬起来刷牙洗脸；肚子不饿就熬到中午，要是饿，便去楼下的医院小吃部吃碗馄饨。小吃部的馄饨咸得要命，大有吃盐不花钱的意思，司徒每吃一回，少不了要抱怨一回，发誓下次再也不来了。结果过了几天，免不了又把发过的誓再发一遍。

医院里的日子，大约总是从查病房开始的。对于不少病人来说，和主治医生见上一面是一天中最重大的事情，但往往只能限制在这个特定的时间里。查病房的结束，也常常意味着一天生活的告别。这是一座国内赫赫有名的教学医院，早一百年前，由几个德国传教士所创办。医院的名气是由一大批留德、留法和留学奥地利的教授，以及一些国内外极有影响的